

## 谈《古文辞类纂》等书的选文标准

陈光贻

选文标准为编辑文集的一门必备学识，《四库提要》集部·总集类小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散佚，使另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指出了选文要有标准的意义。我国第一部总集，是晋挚虞编的《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此书久佚，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其书体例，见它书所记是分体类编录的。后梁萧统编的《昭明文选》，为今存第一部总集；它搜集了前代赋、诗、文章，主要是“辞藻”之作，而论理之文则不录。至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二十卷续二十卷，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唐末之文。真德秀的选文标准，必取论理辨事之文，舍去“辞藻”之作。如于诗歌一类，若闺情宫怨之作，都未取录，汉武的《秋风辞》也不选；它定下选文标准，必取儒学论理之文。后来称《文章正宗》为“谈理”一派，和《文选》主张“辞藻”一派，判若二途。

清康熙时桐城方苞编的《古文约选》，不过继承《文章正宗》“谈理”一派，并无创见。至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以下称《姚氏书》）开辟了新的选文标准，他既继承方苞《古文约选》“论理”之说，兼取《文选》的精华，而更重要的他指

出了文章写作艺术的标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具备有这样标准的文章才取录。《姚氏书》是屏弃六朝骈俪，以其麇乱无章，所以不选；但对于六朝辞赋精华之作，仍兼收无遗。姚氏的理论，古文始于三代两汉的经史，是古文的基础，但是多不胜录，所以录自西汉始。自《姚氏书》出，在文人中推广了“桐城文派”。

继《姚氏书》后第一部文选，是“姚门高第”梅曾亮编的《古文词略》二十四卷。此书凡例说：“姚姬传先生定《古文辞类纂》，盖古今之佳文尽于是矣。今复约选之得三百余篇，而增诗歌于终。”梅氏《古文词略》，于《姚氏书》分十三类外，又增“诗歌略”一类；这类专取王渔洋编的《古诗选》为标准，汰其大半，录李白、杜甫、韩愈的五古诗入此类，这是梅氏根据《姚氏书》选文理论增之。近人光昇作《文论诗说》，详细分析，证明桐城派的“义法”，不专限于文，兼及于诗。嗣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抄》二十六卷，以广《姚氏书》之博。此集以《姚氏书》所分十三类，改为十一类；论著、辞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牋、哀祭、传志、杂记九类，与姚氏同。赠序姚氏有，而曾氏无；叙记、典志，曾氏有，而姚氏无；颂赞、箴铭，姚氏有，而曾氏附以辞赋之下编；碑志姚氏有，而曾氏附入传志之下编。关于选文理论，二者虽有微异，而大体则同。曾氏之说以《姚氏书》选文不载经史，因经史多不可胜录。而曾氏选文，必以六经冠其端，譬如“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于史书曾氏认为《姚氏书》中的奏议、诏令二类，所收《汉书》的文甚多，也不是真能屏弃诸史不录。又《姚氏书》中也不是尽去有韵之文，只论著之文无韵，而辞赋有韵，而哀祭之文，姚氏谓《诗》之遗，固当有韵。总之曾氏的《杂抄》，仍是用《姚氏书》的选文标准。

承《姚氏书》之后的有王先谦编的《续古文辞类纂》。此集

以姚氏为准的，推绎义法渊源；选自清乾隆迄于咸丰，桐城、阳湖二派的名作，旁行直上，统系瞭然。虽然选文的取径有微异，於讲求“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续方、刘以来相传之一派。同时又有黎庶昌编的《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与王氏编的，名同体殊。黎氏编的分上中下三编，上编选录经、子之文，中编选录《史记》、《汉书》、《三国志》、《通鉴》之文，下编选录方、姚前后之文，三编选文共四百四十九篇。此集补《姚氏书》所未备，和曾氏《杂抄》选文之意相合，皆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选文标准。而黎氏此集，更赅循曾氏之说，意在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物训诂诸作。其自序云：“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按其意以振姚鼐所云义理考据词章。自王、黎二《续纂》以后，最后又有蒋瑞藻编的《新古文辞类纂》六十卷，选录薛福成以下若干家之文，参用姚、王《正续类纂》之例。其自序云：“通海而还，士不说学，束六经于高阁；作为文字，破碎支离，举无足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百无一存。”此集选文虽承接姚、王标准，但自咸丰以后，真能为古文者，百不存一；不过保存当时文献，资学者参考而已。

民国初年的国文课本，选文标准仍继《姚氏书》传统，但选文技巧，则注意在学生容易接受，怎样能启发学生对古文感兴趣。陈曾则编的《古文比》四卷，是他在北京优级师范学校教国文时编的课本。自序云：“尝取姚鼐《古文辞类纂》讲论古文，而闻者藐若寡趣，业不加益。盖文章之不为世所重也久矣，以为无用而置之；於是学者愈寡，其为文者寝支离窘澀，不能成章，良可叹也。姚氏所选精华萃集，而非浅学所能解；因取古人论文之言，定选文之例。三反复讲解，乃稍稍启发；所谓渊源、比较、对偶三端。”陈曾则提出的渊源、比较、对偶三端，既是选文的标准，又是教文的方法。他取法宋陈騞的《文则》，选录《公》、《穀》、《左氏》、《礼记》、《论语》，同叙一事

者，比论文词之工拙，最足以启发心智。又采方苞所说：“汉唐以后文字，莫不追摹古人而为之”，选原作和摹作对比。他所说的三端，一是先要明瞭文章渊源，二选同叙一事的几篇文章相互比较，三是选汉唐以前的文，及后世追摹之作对偶，这样能使学生对古文感兴趣。同时吴闿生编的《古文范》四卷，此集取姚、曾二家选文为主，约取三十二家，文不过百篇。又以庄生、韩非、子长、退之、介甫为主要，其余作者每人不过一二篇。这是约选的方法，为学古文的梯径。又唐文治编的《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八卷，这是唐先生中年以后亲自教授大专学生的课本，程度较高。此书义例，专在开示读文和作文门径，以求古文之线索，探悉古书之经纬。须从审文章之命意，辨性质，析理与气，进行研究，才能按门径线索，而知文章“经纬贯通”之道。所谓“经纬贯通”，就是使我的精神和古人的精神相合无间，又能使我的精神，启发后人的精神，不相谋而适相感。按此义和《姚氏书》自序所谓：“文无所谓古今”之义相合。唐先生选文标准的理论很深，要探悉“文无所谓古今”，必须悟文章“经纬贯通”之道。其自序云：“厥后课徒二十年，稍有阅历，忽豁然有悟，知吴先生（指吴汝纶）之言启我。”按当时一般选本国文，都是要使学生易知易解，为何唐先生课徒选文理论，要提到这样的高深，这是赓继黎氏《续纂》序所说：“欲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唐先生自序又说：“近世以来，桐城阳湖号为宗派者，颇能学古人之经纬，稍稍运用于其间；而其气体或茶弱不能振，天资耶？人事耶？抑时代为之耶？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超出乎规矩之外。而又扶之以浩然之气，正大之音，格物致知，所以充其用也。”此书凡例又举读文之法，以三十遍为度，前十遍求其线索之所在，划分段落，最为重要。次十遍求其命意，有言中之意，有言外之意。再十遍考其声音，以求其神气，细玩其长短疾徐抑扬顿挫之致。”又选文每篇

加有圈点，用方、曾二家章法句法的圈点，可和读文法结合研究，容易理解。选文排列，不用分类，也不以时代或作者排次；而用唐先生自所创造的读文作文四十四法，分四十四门排次，每门仅选文四五篇，并详注每一法的应用云云。

## 《现代中国人物笔名录》即将出版

在我国，发表著述不用本名而署笔名状况，自辛亥革命以来至今已相当流行。笔名的出现大都是出于习惯与某种需要。追溯历史，历代中国文人均有名、字、号、别称、斋名、室名等多种称谓。在旧中国，由于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不少人经常改换笔名发表著述，这样就造成了我国现代笔名之多为世所罕见。同时也为这些人物的研究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情况，也为了解决图书著录标准化问题，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将自己工作中长期积累的笔名资料加以补充，考订，汇集成书。在编辑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自三十年代起至今出版的有关中国作家笔名的十余种书刊，查询了作协等单位的文书资料，甚至有些人物的笔名还询问了作者本人。全书共收入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末中国学术界和少数政界人物四千余人的笔名一万二千余个，约八十万字，由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拟将于年内与读者见面。

本书分为两编，“笔名编”按笔名的笔数为序，每一笔名下，注明原名；“原名编”则按原名笔数为序，每一原名列其全部单名。

为了适应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以及检索的方便，笔名和原名均附有汉语拼音与韦氏拼音，并尽可能地注出每人的生卒年月。卷首有《笔名、原名首字笔划检索表》，《首字汉语拼音简繁字对照检索表》，《首字韦氏拼音检索表》等。

·大彬·